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英]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 ● 著

论第一原理

Tractatus de Primo Principio

王路 王彤 等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论第一原理

Tractatus de Primo Principi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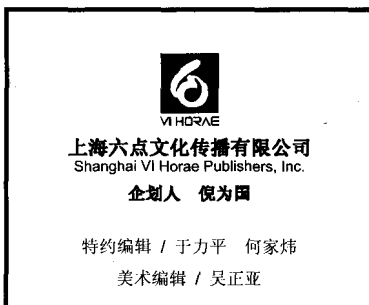
[英]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 ● 著

王路 王彤 等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论第一原理 / (英) 司各脱著; 王路, 王彤等译; 一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3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5784-0
I. 论… II. ①司…②王…③王… III. 经院哲学—研究 IV. B503.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4894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获得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道风书社) 正式授权出版

Tractatus de primo principio

By Johannes Duns Scotus

Copyright © by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889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论第一原理

(英) 司各脱 著

王路 王彤 等译

| | |
|-------|--|
| 统 筹 | 储德天 |
| 责任编辑 |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
| 责任制作 | 李 瑾 |
|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 社 址 |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
| 电 话 |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
| 网 址 |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
| 市 场 部 |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
| 邮购零售 |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
| 印 刷 者 |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
| 开 本 | 890 x 1240 1/32 |
| 插 页 | 2 |
| 印 张 | 10 |
| 字 数 | 200 千字 |
| 版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08 年 3 月第 1 次 |
| 书 号 | ISBN 978-7-5617-5784-0/B·379 |
| 定 价 | 28.00 元 |
| 出 版 人 | 朱杰人 |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20世纪40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40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80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

传统流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棒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导言

司各脱和他的《论第一原理》

文本与版本

认识历史上的某个思想家，首要的途径是用心研读他写下的文本，而不是听信种种哲学史书对这个思想家的什么“主义”、什么“学说”的描述和概括。稍微夸张一点讲，自从出现了哲学通史或思想通史一类读物，历史中的思想就开始变得面目全非；人们以为通过思想史可以更快接近历史中的思想，其实刚好相反。

就思想的事情而言，甚至某位思想家的生平也与我们了解其思想没有太大关系。据一位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美国教授说，思想史研究只有打通社会史才能搞透^①——其实，当这位教授兢兢业业求索清代公羊学复兴的社会关系状况时，公羊学思想的事情已然被遗忘了。再说，有的思想家的生平材料少得可

^① 参见艾尔曼著，赵刚译，《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以及《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怜——比如，史称“建立了自己的学派的思想家和教会学者”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 约 1266—1308, 比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7—1274]晚一代), 其生平和著作都很难考订清楚。^① 对这样的思想家, 是否因其生平史不清楚就可以干脆不理睬了呢?

关注文本而非“学说”, 就是关注纠缠思想者的问题。在读司各脱之前, 我们已经听说过什么“唯名论”、“唯意志论”一类由哲学通史总结出来的司各脱学说; 现在, 如果我们要直接读司各脱的文本, 最好先扔掉诸如此类的标签。

直接研读古代思想家的文本, 当然有不少技术上的困难。即便当今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 也都得有赖于文献学专家对原始文本的校勘, 不大可能直接用未经文献学整理的本子。西学对汉语学者来说更如此, 我们几乎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亲自去整理原始的文本(遑论声称直接从原典的原始语文翻译)。依赖西方学界的校勘和翻译, 仍然必要, 也不可避免。

司各脱的原文著作收在米涅(J. -P. Migne)编的《拉丁教父集》(*Patrologia Latina*)卷一九六, 另有沃丁(Lucas Wadding)

① 司各脱的生平和著述综述的权威版本为 Carl Balić, 《司各脱的生平著作》(Life and Work of Duns Scotus), 载 John K. Ryan & Bernardine Bonansea 编, 《司各脱诞辰七百周年纪念文集》(*John Duns Scotus: 1265—1965*; Washington: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65), 页 1—27。亦参见 Camille Bérubé, 《中世纪个人的认知》(*La connaissance de l'individuel au moyen-âge*; Montréal, 1964), 论司各脱的两章; Hans-Joachim Werner, 《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 载 Hans Freiherr von Campenhausen 编, 《从奥利金到爱拉斯莫的基督教思想家》(*Nimm und lies: Christliche Denker von Origenes bis Erasmus von Rotterdam*; Stuttgart, 1991), 页 247—267。最早研究司各脱的权威论著是哈里斯(Charles R. S. Harris)的两卷本《司各脱》(*Duns Scotus*; Oxford, 1877), 虽然舛误不少, 却不乏见识。笔者所见最新的司各脱思想评述的英文文献为 Richard Cross, 《司各脱》(*Duns Scot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附有较为完备的司各脱研究的英语文献。

编的十二卷本《司各脱全集：附司各脱派对文本的注释、题要和疏解》(*Opera omnia, collecta, recognita, notis et scholiis et commentariis illustrate*; Lyon, 1639; Hildesheim, 1968), 然后有维韦斯(Vivès)编的二十四卷本(Paris, 1891—1895)——这个版本实际上是重印沃丁的编本, 但没有收注释、题要和注疏)。要求汉语学者直接依据这些拉丁语文本来研究司各脱, 恐怕不太可能; 要求某个译者直接从这些文本翻译司各脱作品, 也是过高的要求——尽管我们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够做到。这些版本有的没有经过考订, 有的没有经过整理, 即便我们有了拉丁语很好的人才, 汉译学者没有可能做考订, 何以谈得上按原文翻译? 上个世纪30年代, 梵蒂冈设立了“司各脱著作编辑委员会”(Scotistic Commission), 由巴利奇(P. Carl Balić)神父牵头编辑考订版《司各脱全集》(*Opera omnia: Studio et cura commissionis scotisticae ad fidem codicum edita*), 招集许多专家, 搞了12年才搞出“整理稿”(Ordinatio)中的小小篇幅的两卷(Vatican City Press, 1950)。考订校勘的事情不是可以随便做得成的——清代学者整理十三经, 往往耗费一生精力才搞成一、两部经书。

汉译司各脱的著作目前不可能直接从现有的拉丁文本全集逐译, 必须依赖西方学者的考订整理和翻译。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近20年来, 司各脱单篇论著的西方现代语文译本有了一定的进展: 沃尔特(Allan Bernard Wolter)用力最勤, 他编辑和英译的《司各脱: 哲学著作》(*John Duns Scotus: Philosophical Writings*; New York: The Bobbs-Merrill, 1964; Cambridge: Hackett, 1987 Reprint), 是司各脱论著的一个虽简要却相当精当的选本(有精要的导论); 阿伦蒂斯(Felix Alluntis)和沃尔特(Allan Bernard Wolter)编辑、英译的《上帝与受造物: 自由论辩》(*God and Creatures: The Quodlibetal*

Ques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本;沃尔特还编辑、英译了另一个选本《司各脱论意志和道德》(*Duns Scotus on the Will and Morality*;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86)。亚茨恩(A. von Jaczn)编辑、英译的《或然性与自由》(*Contingency and Freedom: Lectura I 39*; London: Kluwer, 1994),以及弗兰克(William A. Frank)与沃尔特编辑、英译的《形而上学家司各脱》(*Duns Scotus, Metaphysician*; West Lafayette, IN: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1995),都是专题性的编辑和翻译本。^① 汉语学界的司各脱研究值得从这些研究成果入手,接触司各脱的文本。^②

《论第一原理》(*Tractatus de primo principio*)是司各脱最后的著作,在司各脱著作中占有特殊地位,上个世纪40年代就有了米勒(M. Müller)的编辑注释本(Freiburg, 1941)和罗奇(E. Roche)编辑、英译的两个现代文本(New York, 1949);以后又有沃尔特编辑并英译的本子(Chicago, 1966)、克卢克森(Wolfgang Kluxen)编辑、注疏和德译的本子(Darmstadt, 1974);10多年后,沃尔特又修订了自己的英译本(Chicago,

① 其他语种的编辑、翻译本有:阿伦蒂斯编辑并译成西班牙文的《自由论辩》(*Cuestiones cuodlibetales*; Madrid, 1963);布尔努瓦(Olivier Boulnois)编译的《论上帝的知识与在者的单义性》(*Sur la connaissance de Dieu et l'univocité de l'étant*;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8)。

② 司各脱文本的编辑和翻译还见于学刊:Allan B. Wolter 编译,《司各脱论启示知识之必然性》(*Duns Scotus on the Necessity of Revealed Knowledge*),载《方济各研究》(*Franciscan Studies* 11 [1951]),页231—271;Allan B. Wolter & Marilyn McCord Adams 编译,《司各脱对上帝存在的帕里斯式论证》(*Duns Scotus's Parisian Proof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载刊于《方济各研究》42(1982),页248—321;J. Ribailier 编译,《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刊于《中世纪哲学文本》(*Textes Philosophiques du Moyen Age*),卷六。

1982)。

眼下这个中译本由我国学界著名的西方逻辑学史学家王路教授执译,依据的是克卢克森的本子。我之所以选用这个本子,主要是因为它有较为详细的疏解(篇幅比正文多近一倍,由王彤先生译、王路教授校订),这对我们细读原著非常有帮助。在这篇导论里,笔者没有必要再来复述《论第一原理》的主要内容,仅尝试为阅读文本提供一些必要的思想史问题意识方面的说明。

司各脱在中世纪思想史中的位置

如今读古代的思想文本似乎有两个目的:要么,为了从中汲取思想养分——这意味着,历史上过去远久的思想家所想的问题,并不因为事过境迁而不再是问题;要么,为了思想史研究而整理、复述材料。吉尔松(Étienne Gilson,也译日尔松)是西方学界公认的中古哲学—神学研究权威,其名著《中世纪哲学精神》(*L'esprit de la philosophie medievale*)^①可以说属于前一类读法;但吉尔松的大部分论著都属于为了整理思想史材料而写的述评一类——比如他关于司各脱的专著就是如此。^②

思想史研究很难彻底摆脱现代哲学—神学问题意识的影

① 中译本:吉尔松著,沈清松译,《中世纪哲学精神》(台北:商务印书馆,2001)。

② Étienne Gilson,《司各脱学说的基本思想导论》(*Johannes Duns Scotus. Einführung in die Grundgedanken seiner Lehre*; Düsseldorf, 1959)。这类性质的司各脱思想研究的中译文献有:柯布列斯顿(Frederick Copleston)著,庄雅棠译,《西洋哲学史(二)——从奥古斯丁到斯考特》(台北:黎明文化,1988),页652—754。

响,换言之,对思想史上某位大家的解释和定位,倚赖于论者对思想历史的通盘看法;就考究中古哲学—神学思想而言,如果没有将它放在与古希腊哲学和近代哲学的关系中来看的魄力,就不大可能搞清楚中古哲学—神学思想的事情。吉尔松写过一本小书《西洋思想发展史》,试图厘清中世纪哲学与近代和现代哲学的内在关联。全书分四章,第一章题为“中世纪的试验”,以后三章分别讲笛卡尔以后直到20世纪初的哲学。^①在“中世纪的试验”一章中,吉尔松主要讨论了阿贝拉尔(Abaelard)、波拿文图拉(Bonaventura)、奥卡姆(Ockham),然后是代表中古哲学—神学衰落的艾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对司各脱仅匆匆一页带过。^②似乎就中世纪与近代哲学的关系而言,司各脱并不那么重要。可是,业内人士都听说过康德(Immanuel Kant)和莱辛(G. E. Lessing)关于神义论的论述,其问题来源是莱布尼茨(G. M. Leibniz)的《神义论》,而莱布尼茨的神义论问题就与司各脱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③看来,司各脱思想与近代思想的关系,并非如权威的哲学史家所讲的那么简单——力挽西方形而上学衰颓命运的海德格尔在其修习年代以研究司各脱起步,恐怕不是偶然的。

司各脱的著作通常被分为两类:哲学撰述(如《论第一原理》)和神学撰述(如《牛津评注》),前者讲单纯理性可以使人的上帝信仰有何所得,后者讲神学可以帮助形而上学有何所得。

① 吉尔森著,陈俊辉译,《西洋思想发展史》(台北:水牛图书,1989)。

② 同上,页53。此外,蒂利希的《基督教思想史》(尹大贻译,香港:道风书社,2000)几乎等于没有提到司各脱。

③ 参见 Douglas C. Langston,《上帝意愿的知识:司各脱对全知之分析的影响》(*God's Willing Knowledge: The Influence of Scotus' Analysis of Omniscienc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

司各脱试图揭示哲学在意识上的未达之处,限制神学中理性成分的过分突涌,以便维护信仰和神学的空间。^① 神学与哲学在司各脱那里显得要为对方的认识目的服务,其前提显然基于神学与哲学的区分。如果要确定司各脱在中古思想史上的位置,就首先得搞清楚,在司各脱那里何以有神学与哲学的区分?

吉尔松的《西洋思想发展史》虽然几乎忽略了司各脱,但他花了相当笔墨来谈论的一件事情对于理解司各脱相当重要,这就是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哲学对基督教神学造成的压力。^②

哲学史大多会讲这样的思想史常识:经院哲学—神学依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与早期基督教神学更多依傍柏拉图(Plato)不同。倘若如此,我们就要问:为什么基督教神学要从依傍柏拉图转向依傍亚里士多德?

从哲学史书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解释:伊斯兰教思想家阿尔法拉比(Alfarabi)、阿维森纳(Avicenna)、阿维洛伊(Averroes)致力注疏亚里士多德著作,复兴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从而给基督教带来了压力:基督教信仰是否也是一种理性的知识?面对这样的压力,作为基督教神学家,司各脱希望证明,基督教信仰中也有理性成分。^③ 司各脱是苏格兰人,在苏格兰,据说有好几个姓“司各脱”的僧侣思想家。我们说的司各脱有一个

① 参见 P. Bohner & E. Gilson,《神学与形而上学》(Theologie und Metaphysik), 载氏著,《基督教哲学》(Christliche Philosophie, Paderborn, 1954); L. Honnefelder,《如此在者问题在司各脱神学著作中的内在位置》(Der innere Ort der Frage nach dem Seienden als solchen im theologischen Werk des Duns Scotus), 载氏著,《在者作为在者》(Ens inquantum ens; Münster, 1979), Martin A. Schmidt,《司各脱:形而上学与伦理学之间》(Johannes Duns Scotus: Zwischen Metaphysik und Ethik), 载 C. Andresen 编,《教义——神学史教程》(Handbuch der Dogmen- und Theologiegeschichte; Göttingen, 1982), 卷一。

② Gilson,《西洋思想发展史》,前揭,页 29—43。

③ Wolter,《司各脱论意志和道德》,前揭,《编者导言》,页 5。

著名的称呼——“精微博士”(Doctor Subtilis),可见这个司各脱天生有精于思辨的资质。在他之前,有个叫理查德·司各脱(Richard Scot, 1123—1173,通常用他的法语名 Richard de St. Victor 或拉丁语名 Ricardus de Sancto Victore Scotus)的前辈,在苏格兰创立了有影响的方济各僧侣团,在学问上追随安瑟伦(Anselm)和方济各(Francis),把上帝对造物的爱和人爱上帝的律令作为神学学问的中心;他发现,启示对于基督教思想家是无上的权威,对于非基督教思想家却没有权威。从理查德·司各脱到“精微博士”司各脱之间,还有一位苏格兰思想家叫做迈克尔·司各脱(Michael Scot, ? —1236),他借道西班牙把伊斯兰教学问家对亚里士多德的阿拉伯文注疏翻译成基督教的拉丁语言,特别是阿维洛伊的亚里士多德注疏。^①通过解释亚里士多德,阿维洛伊改变了理性在思想秩序中的位置;绝对的真理只能在理性的哲学中找到,信仰启示是人的知性十分虚弱的表现。按照这种解释,哲人的使命就是把人从启示中解放出来,基督教神学的启示基础因此而受到严重挑战。

可是,从哲学史书上我们也晓得,在司各脱时代,启示信仰与理性知识的关系早已不是新问题,司各脱本人所面临的,并非启示信仰与形而上学知识的突发对立,在他之前,已经有好些基督教僧侣思想家作出过思想上的努力,以化解伊斯兰教学问家复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给基督教信仰带来的冲击。既然如此,司各脱思想的历史位置兴许在于:其思想前辈化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给基督教信仰带来的冲击并没有成功,因而需要重

① Alexander Broadie,《司各脱的影子:宗教改革前苏格兰的哲学与信仰》(*The Shadow of Scotus: Philosophy and Faith in Pre-Reformation Scotland*;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5),页 2—6。

新思考解决方案。司各脱深入形而上学问题,不仅因为其思辨天性喜好思考这类问题——理性思辨本身也是一种愉悦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在司各脱看来,其思想前辈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理解成问题。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重新理解,将引导出新的上帝理解,近代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从这种上帝理解的演变中产生出来的。也许可以说,中古思想与近代思想的关联,重要的不是早期或中期的经院神学,而是晚期经院神学——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的研究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我国学界对西方古代思想的研究一向薄弱,相对而言,对中古思想的研究则是薄弱中的薄弱,而中古思想中的晚期经院神学可以说还不曾有人问津。《论第一原理》的翻译出版,至少让汉语学界有机会一睹晚期经院神学的一点原貌。

《论第一原理》的沉思形式

《论第一原理》被现代的史家归为哲学论著,然而,《论第一原理》开首却是一段祈祷文:司各脱向上帝“这位最真的老师”祈求,让属于“芸芸众生”之一的自己有足够的理解力把握上帝显示其名的话语:“我是我之所是。”^①

哲学论著开始于祈祷,在现代哲人看来,匪夷所思。我们一开始就遇到这样一个理解文本的困难:何以哲学思辨开始于祈祷。

理解《论第一原理》的困难还不仅如此。比如,书中提到的人物不多,不像当今的哲学论文,总得扯上几十百把个人,才算

^① 《圣经和合本》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

合乎“学术规范”。如果按提到的人物的年代顺序排列,司各脱提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安瑟伦、阿维森纳。司各脱的形而上学沉思基于这些人的著作,但他的讨论没有事先介绍这些人物的思想,似乎假设了读他的书的人对这些人物的论著已经了如指掌。不仅在国朝学界,就算在西洋学界,也不大找出几个对这五位历史上的思想大家的学说均了如指掌的。至少得熟悉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蒂迈欧篇》、《智者篇》,熟悉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物理学》、《动物学》、《工具论》,熟悉奥古斯丁(Augustine)和安瑟伦的三一论,以及阿维森纳的著作——就我们可以接触到的而言,至少得熟悉其《论灵魂》,尤其该书第一和第五章,^①理解《论第一原理》中的论述才会有起码的基础。

由此我们会想到一个问题:《论第一原理》是写给谁看的?

可以肯定,《论第一原理》不是写给普通信众看的,正如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类书不是写给普通民众看的。僧侣思想家有如尼采所谓的隐士,在修院大墙内沉思。形而上学流传到市场,是启蒙时代的事情。

《论第一原理》在形式上很可能遵循着形而上学论著的格式,全书分四章,似乎“四”是一种论证的阶梯形式。^②第一章篇幅最短,有如形式逻辑推理程序中的大前提,仅仅提出要讨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思辨基础:划分“四种秩序(次序)”,并说明这种划分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来的。

① 伊本·西那(阿维森纳),《论灵魂》(北京:商务,1985),北京大学哲学系译。

② 西美尔有《形而上学四章》,施米特(Carl Schmitt)给其《政治的神学》(*Politische Theologie*)按了一个“主权学说四章”(Vier Kapitel zur Lehre von der Souveränität)的副题,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导论》没有题为“四章”,实际上是四章。

第二章的篇幅比第一章稍长,其实也很短,有如形式逻辑推理程序中的小前提,进一步瞄准问题——论题的展开:秩序中何者是优先的。在讨论一开始,司各脱就提到了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为什么提到奥古斯丁,而非阿奎那或别的哪位经院神学前辈?显然,这不仅仅因为,秩序中何者优先的问题与上帝在存在秩序中的位置问题是相关的。要么,在司各脱看来,阿维森纳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确实撼动了奥古斯丁建立的基督教神学大厦的基础,要么,对于司各脱来说,如果要应对形而上学的冲击,还得回到奥古斯丁——这也许意味着从亚里士多德回到柏拉图。阿维森纳随奥古斯丁之后出现了(2:4),^①这清楚表明,阿维森纳的形而上学著述的确给基督教神学带来了一些必须解决的难题。问题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带来的:什么是第一原因。司各脱多次引用阿维森纳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疏解,绝非偶然。在司各脱之前,已经有好些基督教神学大师致力化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冲击,司各脱没有提到这些神学大师,但我们肯定不能说,他不晓得这些前辈的解决方案;毋宁说,司各脱相当清楚,问题的要害在前辈们那里被忽略了——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论第一原理》实际上暗含着对经院神学前辈的批评。

第三章从形式上看当是给出大小前提后的推论,同样以祈祷开头:

我主上帝,你确实说过,你是第一的和最终的,你教导
你的仆人通过理性来证明他有以确切无疑的信念所把握的

① 这里指关于第二章第四个结论的正文部分,下同。——编注

东西,即你是第一起作用的东西,第一优越的东西,以及最终的目的。

第三章进入对形而上学问题的沉思,祷文提示了司各脱的意图:对上帝的信仰如今遇到了形而上学,司各脱希望通过形而上学来证明自己的信仰。这并非因为基督信仰需要形而上学的证明,信仰本无须这样的证明;毋宁说,既然世上有形而上学这种证明,那我们也不妨用来证明一下对上帝的信仰。

《论第一原理》是哲学著作?哲学并不沉思基督徒的上帝,神学家也不沉思哲人的本体。然而,如今形而上学问题成了学问领域的主导问题,喜好思辨的信徒就不能撇开这些问题。上帝与形而上学的世界的关系,不能等同于上帝与世界的关系;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圣经》已经讲清楚了,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讲了另一种世界的构成,对沉思的基督徒来说,必得对这一形而上学的世界构成作出回答。^①司各脱的主要沉思对象与其说是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如说是阿维森纳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解释(尤其参见3:18)。在这一章里,司各脱试图确定形而上学思考的前提,这就是第一章中提出的秩序——最后的祷文再次强调:“对于每一种理智来说,每一个是者都是有秩序的东西,……因此,对于从事哲学研究的人来说,去掉某种东西的秩序是不可思议的。”

第四章最长,似乎是在给出大小前提并经过精微推论后对形而上学问题的一个总回答,因而,沉思对象转向亚里士多德本人(4:3)。看起来,对于司各脱来说,如果要面对亚里士多德的

^① Hans Blumenberg,《秘思考》(*Work on Myth*; Mass.: MIT Press, 1990),页215—261。